

东南越族的形成及与高山族关系

陈国强 郭志超

在研究我国东南越族的源流中,探讨东南越族的形成是个关键问题。东南越族的形成即指中国东南地区诸越民族各自的形成、产生、出现。这就必然牵涉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和具体考古材料、文献记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才由部落发展、溶合成为民族。因此,东南诸越民族也应该是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才形成;在此之前,只能算是东南诸民族的先民、前身、来源,只能称为越人。高山族是祖国台湾省的先住民、土著民族,其前身是东南越人的一支,唐代以后才有一些马来人和其它民族的人民迁入台湾,与当地土著融合,到明代才发展形成高山族,她和东南越族特别是闽越族及其先民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

一、东南越族的形成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人类的历史,从蒙昧时代低级阶段的原始群和血缘家庭、发展到蒙昧时代中级阶段才发展为父系氏族,要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才由部落发展、溶合为民族。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正如斯大林所指出:民族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①作为民族特征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并不是人类一出现就具备的。在早期的原始群和民族部落,是以共同血缘为纽结的人们共同体,他们还不是民族,只是民族的前身。

氏族部落发展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它们逐步从血缘组织发展为具有共同地域特征的地缘组织。马克思早就指出:“古代各国的部落都建立在两种方法上,有的按氏族,有的则按领土。按氏族特征组成的部落,比之按领土特征形成的部落,较为古老,而前者几乎到处都被后者所排斥。”^②明确地说明部落由按氏族特征组成发展到按领土特征形成。

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是母系氏族繁荣时代。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才逐步转入父系氏族社会。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对外都不得不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③指明由部落溶合为民族。由于私有制的发生，贫富分化，零星奴隶制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以血缘为纽结的民族部落解体，出现了最早的农村公社。恩格斯指出：“这些农村公社便成为构成民族的实际政治单位了”。^④

根据以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我们应该区分东南越族的来源和形成是两件事，凡是民族形成以前的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都只能看作东南越族的前身、来源，还不是民族，只能称为越人；只有到野蛮时代后期，东南诸越人才由部落溶合为民族。

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从一般的原始社会文化发展程度来看，是“从铁矿的冶炼开始的，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⑤但从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国的远古历史来看，她们早在青铜时代就已离开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阶级社会。因此，论述我国东南越族形成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就不能以铁矿的冶炼或青铜器的使用作为开始的标志，而应该是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末期。易言之，只有新石器时代文化末期的主人，才开始形成为诸越民族。

东南越族，是东南地区具有越族文化特征的若干民族的概称。这些越民族大都是当地土著居民发展而来的。她们形成民族的时候先后不一，见于历史记载也先后不一。据历史记载：东南越族在春秋有于越，在秦汉有瓯越、闽越，在三国有山越、安家族以及山夷等。除山夷外，她们都已形成为民族。

春秋时，于越居地初以会稽为中心，到勾践初年的区域是：北起御儿（今浙江崇德县），南到浙南闽北交界，东起甬定（今浙江舟山岛），西达江西鄱阳湖东岸。勾践灭吴后，管辖地域更广，历几世后为楚国所灭。于越分布地域主要在今浙江及江西东部一带。

秦汉时，有瓯越和闽越。瓯越也称东瓯，居住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一带。《山海经》载：“瓯在海中”，郭璞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也。”故瓯越不仅在永宁县（今浙江温州），还包括沿海和岛屿。闽越居地在今浙南闽北一带。秦朝统一南方后，废越东海王摇及闽越王无诸为君长，在闽越地区设闽中郡。《山海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可见闽越也分布在沿海及海上岛屿。包括今澎湖列岛和台湾岛等。

三国时，有山越、安家族、山夷等。山越居于吴之会稽、新都、丹阳、豫章、吴兴、鄱阳、东阳、吴兴、卢陵等郡山地，即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山区。安家族在浙南闽北。在台湾的山夷，据沈莹《临海水土志》记载，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尚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

以上历史记载的于越、瓯越、闽越、山越、安家族已形成为民族。追溯其形成民族的上限，应在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期至青铜时代开端的时期里，即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下限的时间不一，大体上浙江比福建早，福建又比台湾早，这就反映东南各地越族形成时间的早晚不同。

二、东南越族内部社会发展

为了探讨东南越族各族团形成民族的时间，我们除了根据有限的文献材料外，还必须参考

东南各地新石器时代下限或青铜时代上限的年代。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东南越族形成民族的时间,要比根据历史记载所得的结论早一些。

在浙江,是于越和瓯越主要分布区域。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很丰富,先后发现了几处重要遗址,包括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三个发展阶段。河姆渡文化约为5000—4750B.C.,马家浜文化约为4750—3700B.C.,良渚文化约为3300—2500B.C.^⑥;接着是印纹陶流行时期。在良渚文化以后的印纹陶遗址,大约可归纳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地和瓯江水系四个区域。除瓯江水系的面貌和福建有许多相似之处外,另外三个区域总的特征还是接近的。浙江省博物馆研究者认为:“从中原先后建立夏、商、周奴隶王朝(前21世纪)起,到越国兴灭(前4、5世纪)的阶段,正是我省几何形印纹陶流行的时期。全省已发现此类遗址数百处。范围遍及绝大部分县。在这些遗址中往往有石器伴出,但亦常有冶炼或使用青铜器的迹象。……从地层关系看,也可以证明印纹陶晚于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晚期(一层)。从我省已发现的印纹陶遗址看,……它们既受良渚文化的影响,又较多地继承了河姆渡文化的因素。应属青铜文化的产物,上限年代应早于商代”。^⑦至于瓯越,从浙南瓯江流域的印纹陶和福建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窥见,瓯越与闽越的关系更为密切。

结合文献,于越是东南诸越最著名的一支,见于历史记载较早。越王勾践(公元前497—465年)以前的漫长历史,《史记》概括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⑧《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有一段稍加补详:“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余岁。……自后,稍有君臣之义,号曰无壬,壬生无睢。睢专心守国,不失上天之命。无睢卒,或为夫谭,夫谭生允常。常立,当吴王寿梦、诸樊、阖闾之时,越之兴霸自允常矣。”^⑨这段叙述反映了于越从原始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后发展的大略情形。《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092)“于越来宾”。《史记·正义》引《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于越。”一世(叶)算三十年,周敬王在位期是公元前519—447年,据此可推测,于越建国似始于公元前14世纪。然而,据可靠的考古材料分析,于越建国还可以追溯得更早,而于越形成民族应为商代以前的事。这个结论不至于太离事实。甲骨文中有关于“王戌于上雩”的记载,据郭沫若考证,“上雩”即今浙江“上虞”^⑩。范文澜指出:“……中国东南方广大地区的越族,远在夏朝与华夏文化就有接触,甲骨文有戊国,疑即越国。”^⑪

福建是闽越的分布区域。福建西北部靠江西,浙江的崇安县武夷山架壑船棺已取下二具,造型规整,遗留金属工具加工的痕迹,应是青铜时代的遗物。棺木经碳14测定,一号船棺的年代数据有二个:距今3,840±60年^⑫,距今3,370±80年^⑬。二号船棺的年代数据是距今3,235±80年^⑭。前两个数据相差太大,后两个数据相近,似较可靠,相当商代晚期。福建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昙石山文化和黄土仑两遗址。在闽北闽侯县的昙石山文化遗址,分为中下上三层,反映了福建新石器文化发展顺序。中层以绳纹陶为主,

其中两个贝壳(长牡蛎)经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090±90年和距今3,005±90年^⑤。上层以印纹陶为主,一般认为系青铜时代遗存。稍后的闽侯黄土仑遗址出土大量几何形印纹硬陶,出土木炭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1300±150B·C·,即距今3250年左右,约当商代晚期^⑥。黄土仑遗址相当于昙石山遗址上层,出土印纹陶器的雷纹、回纹,与福建光泽、东张、南安大盈等地出土青铜器当花纹类似。在闽西龙岩、长汀、闽南惠安、晋江、漳州等地也发现有新石器 and 印纹陶。在厦门岛上发现有石斧、石铤和印纹陶片。而在金门岛上富国墩贝丘遗址,下层划纹陶片测定年代为距今6,130±370年(B·P·,1950年起算,以5,568±30年为半衰期),中层为距今5,800±340年,上层为距今5,460±320年^⑦。关于福建青铜时代的上限,根据现有考古材料分析,系商末周初。因此,至迟在这时,闽越人已形成民族。

结合文献记载,闽越继于越之后出现于史籍。《史记》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⑧这段史料反映了闽越、瓯越与于越的密切关系。闽越是比于越较后形成的民族。根据《周礼·职方氏》提到:“七闽”,可推测闽越早在周代已有活动。又史载:秦朝在征服闽越之后,在原来越族集中地区设置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加强管辖。其中闽中郡应在今浙南、闽北一带,“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到汉代,因“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有功,“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⑨闽越族在秦汉时代早已建立了国家,故其形成为民族的时间,应如上述以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拥有印纹陶的主人即闽越民族。但各地情况不一,社会发展不平衡。值得指出的是:上述金门岛富国墩贝丘遗址据台湾考古学者研究,属于大坌坑文化类型,年代最早,其性质、年代需进一步探讨研究,但目前可视为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主人只能认为是闽越形成民族以前的闽越人。

在台湾,是山夷(夷州人)和后来流求土人的居地。台湾和祖国大陆原始文化的源流关系,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台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及全岛。已有的考古材料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居民便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早是大坌坑文化,从公元前一万年到公元前二千五百年。韩起认为大坌坑文化明显是属于祖国东南沿海古代文化(以粗糙的绳纹陶为代表)的一部分^⑩。比大坌坑文化稍后的圆山文化,据台北圆山贝丘的贝壳测定年代为距今3,860±60年到3,190±80年,下限可能到公元初。林惠祥同志指出:圆山文化应是从大陆东南部迁移过去,至于传播的路径应以福建较有可能,因闽台相距最近,中间又有澎湖列岛,澎湖又曾发现彩陶等^⑪。与圆山文化同时又稍后的凤鼻头文化,紧接在大坌坑文化之后,又可分为三期(类型),其中第一期(印纹红陶文化类型)年代大约是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之间。第二期(素面和刻纹黑陶文化类型)年代大约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公元前。这期出土遗物与闽侯昙石山的相近。夏鼐教授指出这时台湾和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人民,在生活文化上已经有密切联系,来往频繁^⑫。第三期(印纹和刻划灰黑陶文化类型)从公元初延续到十六、七世纪汉族文化大量输入为止。

结合文献记载,首先记载台湾和高山族祖先的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称台湾为夷州,称台湾的土著民为山夷、夷州人,说在台湾山上“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当时山夷的生产工具“唯用鹿角(角)矛以战斗,磨砺青石以作矢鏃、刀斧、环贯、珠珰。”^⑬这些记载,说明山夷是越人的一部分,还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相当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到六

世纪的隋代,《隋书》称台湾为流求,称台湾的土著民为流求土人,他们的生产工具比山夷进步,已“有刀、稍、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②4}。虽已有少量铁器,仍大量使用石器,比起山夷社会已较进步,但仍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这些记载和台湾凤鼻文头化的第二期相印证,可见这时尚未达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山夷和流求土人是东南越族的一支,仍处于氏族部落阶段。

综上所述:在浙江、福建和沿海岛屿,以及台湾岛,都是东南越族或越人分布的地区,各地越族形成的时间前后不一,各族内部社会发展也不平衡。关于各地越人溶合和发展情况,还有待今后更多考古发现来印证。

三、高山族的祖先是越人的一支

高山族是祖国人民对台湾省少数民族的概称,是台湾的先住民、土著民族,现在台湾有的学者称为山地同胞,简称山胞,又分为平地山胞和山地山胞。除散居西部平原的平埔人外,住在中部山区和东部纵谷平原的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曹人、排湾人、鲁凯人、卑南人、阿美人、和兰屿雅美人,共约二十九万一千多人。

关于高山族的来源,林惠祥、凌纯声先生都作过研究,认为高山族的祖先是大陆迁去的一支越人^{②5}。1961年,陈国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参加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访问大陆上高山族同胞所得的材料,撰写《高山族来源的探讨》一文指出:

“高山族的来源是多元的,主要是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这是综合考古材料、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所证实的结论。”^{②6}后来,根据台湾考古发现的新材料,1979年,又撰写《从台湾考古发现探讨高山族来源》一文,参加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再次论证高山族祖先是祖国南方古代百越的一支,先是三国的山夷,后是隋代的流求土人,唐代以后,才有马来人等迁入台湾,最后才溶合形成高山族。因此,“高山族最早主要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外,后来也包含有其它来源,但这些都是较晚近的事。”^{②7}这个意见,也符合上述民族形成的理论和考古发现、文献记载。

从历史发展来看,台湾考古发现最早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左镇人”和“长滨文化”主人,属于氏族部落最初阶段。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第一、二期,也只属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母系氏族社会。只有从凤鼻头文化第三期开始,对照沈莹《临海水土志》所述,三世纪山夷的生活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社会组织还没有等级差别,没有政权和国家机构,还是过着母系氏族社会生活,还没有产生私有制和“零星现象的奴隶制”,还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直到六世纪,《隋书》所载流求土人的社会经济生活,比较山夷进步,生产工具主要使用石器、骨角器,也有使用少量铁器,应是处于金石并用时代,尚未进入青铜或铁器时代;社会组织也还没有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观念,已经产生私有制,行买卖婚(需用酒看珠贝为聘金),他们已离开母系氏族公社,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野蛮时代中级阶段^{②8}。流求土人是山夷的后代,系百越的一支,还没有进入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还没有形成民族,是高山族的祖先。

唐代到明代,有少量马来人、金人、汉人等迁入台湾,有的溶入高山族祖先中去。如在唐代,有南洋马来人、吕宋人迁入台湾,溶台于当地土著居民中。“唐贞观间,马来群岛洪水,不获安处,各驾竹筏避难,漂泊而至台湾。……故《台湾小志》曰:生番语言,出自马

来者六分之一,出自吕宋者十分之一,迄北十七村多似斐利宾语,说者谓自南洋某岛迁来,其言近似。”^{②9}宋元时代,有一些汉人、金人迁入台湾,有的溶合成为高山族祖先的一部分。“宋末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者,聚众以居,男女婚配,故番语处处不同。”^{③0}又:“相传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为飓风飘至,各择所居。”^{③1}但这只说金人迁居台湾,未直接言明与原居民溶合。明清时期,当高山族已形成后,在清代近三百个番社中,也有个别番社有汉人迁入溶合,如“南社猫儿干二社番,其祖兴化人,渡海遭飓风,舶破漂流到台,娶番妇为妻,今其子孙婚配,皆由父母主婚,不与别番同。”^{③2}“嘉庆末,有粤人黄祈安者子身来台,……从番俗,改名斗乃,娶番女为妇,生二子。”“咸丰年间,泉州人郑勒先至埔里社与番族互市,从番俗,改姓名”^{③3}。所载的溶合到高山族的人数很少,是极个别例子。还有的记载,如“新港、肖垄、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后迁于此。”小琉球是台湾西南部附近小岛,属台湾省,这只能认为是高山族在台湾内部的迁移,不能认为是外族溶合。

此外有的学者还提出有少数小黑人、琉球人、婆罗洲人及密克罗尼西亚诸群岛的居民,迁入溶合于高山族^{③4}。但是,过去学者对他们迁入台湾溶合于高山族的时代,还缺乏具体材料,有的只从个别文化特征去推论,缺乏有力论据,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比如说小黑人,在高山族传说中有小黑人(矮人)的事情,据说当古代高山族生活在台湾时,有的地区婚娶夏人、布农人等还有和小黑人接触,小黑人身材矮小,动作敏捷,力气颇大,后来才被高山族消灭^{③5}。直到现代,有的高山族还流传小黑人传说,并且保留在他们的崇拜习俗中,如至今赛夏人每隔两年逢农历十月十五日分别在向天湖及大隘村举行三天“矮灵祭”(Pasitaa),又称巴斯大溢祭,以古代矮人Aetas为对象,据说因为他们过去消灭过矮人,怕矮人灵魂不散加祸于高山族,故祭祀以祈求平安。既然传说高山族已设计把他们都已消灭,并没有留下活人或妇女小孩,怎能溶合到高山族中去?又如密克罗尼西亚人,居于太平洋中的80个岛屿上,他们的历史长期孤立地发展着,据民族学家研究,东密克罗尼西亚的文化是波利尼西亚的成分占优势,西密克罗尼西亚的文化是印度尼西亚的成分占优势。他们的文化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③7}。还没有密克罗尼西亚人西迁的史料,要说密克罗尼西亚人迁入台湾溶合于高山族,从横隔太平洋和生产力水平低下来看,是很困难的事,还应该具有具体证据才能论证。

明代,高山族祖先才进入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形成为民族,称东番夷。据陈第《东番记》记载:东番夷“别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这种番应属原始社会后期的农村公社。他们生产比以前发展,虽还没有铁农具,但狩猎已用竹柄铁镞武器。农业畜牧业已很发达,农作物有小豆、胡麻、薏仁、葱、番薯等,家畜有猫、狗、猪、鸡等^{③8}。虽还保留原始社会特点和习俗,但比起流求土人已进了一步,他们已跨进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形成为民族。进入清代以后,称为番族,已有近三百个番社,又有野番、生番、熟番之分、反映了高山族内部社会发展也不平衡。但番族已在文献记载中作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了。

综上所述,高山族的祖先从远古到隋代,是我国南方百越的一支,唐代以后,才有其他不同成分迁入溶合进去,但人数很少。高山族到明代才跨入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形成为民族。高山族是以古越人为主体的,后来溶合少量其他成分形成的。高山族的来源是多元的,但不能等量齐观,具体溶合进来的少量其他成分,还须今后进一步研究。从高山族是以古越人为主体的,后来才溶合少量其他成分这一点,使我们认识到高山族与祖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密切血肉关系。

一九八二年九月

- ①《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6页。
- ②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选集》第4卷,第160页。
- ④恩格斯:《法兰克时代》,《马克思全集》第19卷,第540页。
- 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选集》第4卷,第20页。
- ⑥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
- ⑦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20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
- ⑧《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 ⑨《吴越春秋》卷六
- ⑩郭沫若:《卜辞通纂》,第130页;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60页,三联书店,1979年第2期。
- ⑪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33页,1978年6月第5版。
- ⑫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14实验室:《碳14年代测定报告》,《文物》1978年第5期。
- 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考古》1979年第1期。
- ⑭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14实验:《碳14年代测定报告》,《文物》1980年第2期。
- ⑮福建省博物馆:《闽侯县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 ⑯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初稿),1978年8月。
- ⑰张光直:《中国考古学上的放射性炭年代及其含义》,台大《考古人类学刊》37、38期,1975年。
- ⑱⑲《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
- ⑳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
- ㉑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 ㉒夏鼐:《碳一一四测定年代与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 ㉓《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四夷部一。
- ㉔《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列传。
- ㉕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凌纯声:《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台湾,1979年版。
- ㉖陈国强:《高山族来源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 ㉗陈国强:《从台湾考古发现探讨高山族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 ㉘陈国强:《从两篇史料看台湾古代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 ㉙连横:《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
- ㉚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九。
- ㉛郁永河:《裨海纪游》。
- ㉜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五。
- ㉝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五。
- ㉞施联朱:《高山族族源考略》,《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
- ㉟铃木作太郎:《台湾の番族研究》,第129—132页,日本,1932年版。
- ㊱刘其伟:《台湾土著族文化艺术》,第64页,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
- ㊲C. A. 托卡列夫, C. 兀. 托尔斯托夫 主编《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下册,第三十四章,三联书店,1980年版。
- ㊳陈第:《东番记》,见沈有容《闽海赠言》。